

专栏导语：“蚁族”与大学生就业

岳经纶 陈永杰*

2010年，在毕业时仍未找到工作的大学生高达175万。今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超过670万，他们如何就业、有多少正面临失业的困境，是一个社会各界都很关注的问题。2003年以来，在应届生毕业离校时统计的“初次就业率”一直在70%左右徘徊。换言之，毕业即失业的同学一直在三成左右，即使是按到年底时再整理而来的“最终就业率”计算，毕业后再熬了半年还是失业的大学生仍超过一成。今年经济形势恶劣，美国信贷评级下调、美元走低拖累中国经济，即使按过去几年的规模推断，毕业时仍前路茫茫的大学生将会有200万之众。

200万个寄望“读书改变命运”的学生，后面是200万个家庭，近千万的人口。这些主要来自社会弱势阶层的家庭，从三四年前看着子女拿到入学通知时担心学费如何筹措，一直熬到现在，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但现实却是他们非但不能每个月收到子女参加工作后的汇款，不少还要继续汇钱给子女在大城市里苦撑下去，以便继续在求职中寻找出路和希望。这些“蜗居”于城中村、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更加没有户籍的大学毕业生，被一些学者称为“蚁族”（廉思，2009；2010）。有统计数据指出，在全国上下，“蚁族”有百万之众（潘晨光，2010）。

我们认为，规模如此之大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但值得整个社会关心，还很需要学界更多的研究与建议，本期的专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专栏，三篇文章之间的关联性相当高，原因是几位作者共同参与了一个关于“蚁族”问题的研究，并从该研究中分别整理出各自的文章。这个专栏的构思来自一年前几位主要作者的闲聊：谈及当时很红的“蚁族”与“蜗居”，可能因

* 岳经纶，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陈永杰，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讲师。

为大家都是所谓的“70后”和“80后”，对年轻人的处境有真切的体会，更有趣的是大家的学术背景不同，如果能以不同的视角来讨论此问题将是一件相当有意思的事情。

“蚁族”一词最初由一些娴熟于撰写报告文学的记者提炼而来，后来被廉思正式提出，成为2009年最红的一个词。然而，为何十几年前仍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现在却面对着如此困难的就业局面呢？要透彻了解“蚁族”的问题所在和找出应对措施，应当先回过头来思考他们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他们有什么需要，然后为何现有政策措施没有适当地回应。

陈永杰与卢施羽的文章通过整理和回顾文献，分别回应了这几个问题，为这个社会问题描绘出了一幅宏观的图景。他们指出，如同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的出现与国企改革和户籍制度有着深刻的联系一样，大学毕业生的失业问题与大学生就业制度的变迁有关，与此同时也与扩招过快、我国产业发展不平衡等因素有关。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蚁族”的出现就是教育制度内更深层次的一系列问题的结果，集中反映在学生即使努力读完大学，也仍无法摆脱其原有的社会阶层的命运，亦即“教育改变不了命运”。该篇文章从社会政策的视角出发，进一步探讨了现有的应对措施及其背后的政策思路，发现现有政策并未真正触及“去商品化”与“去阶层化”这些体制性问题，仅仅停留在市场供求平衡与人力资源的计划调配等相当局限的应对措施之上，而相关的积极劳动力市场，又相当普遍地存在仅有政策，而资源不配套的问题，成效甚微。文章提出，落实这些就业政策是短期内的重要工作，但从长远而言，“蚁族”不可能在一个公平的社会机制缺位的情况下自然消失。

温卓毅与岳经纶的文章，相当详细地回顾了关于“蚁族”这个概念的多次争论，尝试从“在职贫穷”的角度来思考“蚁族”的问题。廉思在2009年推出《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一书，适逢金融海啸后大学生就业最为艰难的时刻，“蚁族”一词随即与“蜗居”一起，成为两个当年最受媒体尤其是年轻人群体关注的概念。然而，“蚁族”的概念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提炼，其在学术研究上的应用屡屡碰壁。文章首先回顾和辨析了“蚁族”的概念，提出应该以“弱势大学毕业生”这个更为严谨和准确的概念来描述该群体。这篇文章认为，大学毕业生和青年农民工都是青年就业的组成部分，诚然中国各大城市都新出现了相当

数量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但有不少研究认为，他们的低收入和聚居只是一种过渡现象，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城市新型贫穷中的“在职贫穷”，并建议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制定政策干预措施。

上述两篇文章都触及了现行政策的一些盲区，那就是一味地要求学生就业，片面地追求高的就业率，而不问他们就的是什么业，领的是什么水平的工资，有没有各种合理合法的保障。结果只是拉高就业率，让有关部门面子上好过一点而已，未能真正让高等教育发挥其推动社会流动、推进社会公平的作用。从某个意义上讲，这种一味强调就业率而不看就业质量和就业目的的逻辑，与声称中国人最要紧的是有牛奶喝，而不管牛奶的品质是否达到国际公认的合格水平，可谓如出一辙，绝非社稷之福。

在百万大学生失业的背景下，“蚁族”概念的出现，无疑进一步引起了官方对大学生就业率的重视。但社会大众尤其是学术界更应该关心的却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而应进一步触及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变动过程。文化学者叶荫聪的文章正是想从这样的视角来反思“蚁族研究”。叶荫聪的文章尝试以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角度，审视“蚁族”研究背后一些未经反思的概念范畴，并指出“蚁族”这个概念其实是掩盖了，而并非揭示了当代中国变动中的阶级变动过程。因此，这篇文章提出，要令社会科学视野具反思性，需要对相关现象重新概念化，结合上改革开放以来的阶级及阶层学术讨论，并把问题意识由针对一个特定群体，转移到更广阔的时空及政经脉络中，尤其是“文化”及“阶级”的新互动关系中。

媒体报道，“蚁族”们前几年陆续退出“北上广”，涌往二、三线城市寻找机会，但今年又要回归这些一线城市了，因为这里“公平”一些（单士兵，2011）。但是，这百万之众寻的是什么“公平”呢？原来，像《蚁族》中的唐家岭那样的生活，几年下来，跨州过省之后，发现原来已经是比较“公平”的了。这种现状的出现，让人担心大学生失业问题已经进入“滚雪球”阶段。2011年的仲夏，“农村孩子无法进入名校”成为了高考新闻中最受人瞩目的一条。

事实上，教育不公平与社会的阶层固化，早就在中小学时出现，也并未到大学结束，因为所谓的“教育回报”主要是看就业情况。如果说找到一份收入体面的工作并且解决了户籍问题是最起码的标准，那么这正是很多农村生源所难以企及的。“蚁族”问题“滚雪球”，其实就是农村孩子无法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最核

心反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我们的年轻人对前途却难以有一个很好的盼头，无论是二代农民工，还是这些主要从农村出来读了普通本科或高职高专的大学生，他们的青春时代都遭遇了无处安置的尴尬。希望这个专栏能为让更多人关注这些年轻人的命运，为未来中国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制度作出它的微薄贡献。

参考文献

廉思 (2009). 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廉思 (2010). 蚁族Ⅱ——谁的时代. 北京：中信出版社.

潘晨光编 (2010). 中国人才发展报告 (2010-2011).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单士兵 (2011). 为何又逃回“北上广”. 北京晨报, 7月18日.